

华阳太后是不是葬在了咸阳原上？

公元前 265 年，从赵国归秦的落魄公子异人做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他听从吕不韦建议，特地换上楚国的服饰，着华阳夫人的故国衣冠前去觐见这位父王最宠爱的夫人。华阳夫人见之心悦，当即认其为子。异人从此改名“子楚”，从一个被放逐的边缘人，一跃成为秦国嫡嗣、太子，最终于公元前 250 年登基为秦庄襄王。而在他之后，其子嬴政登基，秦一统六国，成就千古霸业。

历史上的华阳夫人，堪称战国末年最惊心动魄的权力棋局中，最关键的一枚棋子。她出身楚国平氏贵胄，深居后宫，荣宠无极，却有一个致命的心病——膝下无子。当商人吕不韦用一场豪赌，将在赵国当质子的嬴异人推到她面前时，所有身处时局的人的命运，在那一刻都被彻底改写。这位站在权力暗影里的女人，用一次选择押中了整个秦国的未来，间接促成了秦始皇的登基。

2026 年 8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考古与文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一座沉睡于咸阳原黄土之下的千年大墓，以夺人眼球的姿态再次闯入大众视野。作者赵汗青在文中提到，咸阳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可能就是这位华阳太后。

咸阳原上的第四座秦陵 墓主身份备受瞩目

2022 年，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项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召窑村南的上召窑秦陵北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勘探显示，这座陵园平面近方形，呈“回”字形双重结构。外兆沟长约 600 米，内兆沟长约 540 米，陵园北部设置门道，门道两侧疑似存在门阙基址；内园墙仅残存基槽，陵园内坐落一座带覆斗形封土的“亚”字形大墓，以东墓道作为主墓道。45 座陪葬墓整齐分布在北侧内外兆沟之

间；15 座祔葬墓位于北内兆沟以南，呈东西向排列，部分附带车马坑或独立兆沟；62 座祭祀坑集中分布在外陵园西北部，坑内未见实体祭品。

这是咸阳原上发现的第四座秦陵。本世纪初，考古工作者陆续在这里发现并确认了周陵镇、严家沟、司家庄 3 座秦陵园。自秦襄公立国到秦朝灭亡，560 余年里，秦人营建了 30 多座公、王、帝陵，散落在从甘肃礼县到陕西临潼的 8 处陵区。而咸阳原正是战国晚期秦王与王后最后的归宿。

20 世纪 80 年代，阎文儒首次通过文献考证提出“周陵实为秦陵”，开启了咸阳原秦陵研究的新篇章。此后，刘庆柱、李毓芳结合田野调查，初步将这些陵墓与秦国君主联系起来。田野考古资料及相关历史文献证实，构成秦陵建筑形制的基本要素至少应有：陵园、封土、墓穴、礼制建筑、陪葬坑、祔葬墓、陪葬墓、园寺吏舍、陵邑、道路及刑徒墓地等十余个部分。而周陵镇、严家沟、司家庄 3 座战国秦王陵园的特征基本相同，由兆沟、园墙、陪葬墓、祔葬墓、祭祀坑等要素构成；兆沟（园墙）之间分布有陪葬墓；墓道周围的园墙（兆沟）将陵园分为内、外两重；带封土的“亚”字形大墓位于内陵园中部。周陵镇秦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北侧。陵园内共发现外藏坑 27 座、建筑遗址 5 处、小型墓葬 168 座。严家沟秦陵位于周陵街道严家沟村北侧。陵园内共发现陪葬坑 12 座、建筑遗址 3 处，以及祔葬墓 600 余座。司家庄秦陵位于周陵街道司家庄村北。陵园内共发现陪葬坑 6 座，主陵周围 4 座，“甲”字形墓南侧 2 座。建筑遗址 3 处，分布于中陵园东部、西南、西部。

此前多年，考古学界对咸阳原上 4 座秦陵的墓主人身份多有推测。但这 4 座大墓究竟对应哪几位君主？惠文王、悼武王、孝文王，还是他们的后妃？学界争论了几十年，始

终没有定论。

4 座秦陵墓主是谁？ 一个跨世纪的身份迷局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秦公、秦王的葬地或陵园名称，但并未指出惠文王、悼武王、孝文王所葬“公陵”“永陵”“寿陵”的具体位置。后世学者根据《汉书》《括地志》等历史文献中关于“亭部”及“咸阳县”的记载，普遍认为这 3 座陵墓位于咸阳原上。

业界部分权威学者认为，周陵镇秦陵应该是惠文王“公陵”，主要依据是《史记》中关于“葬公陵”的记载和《括地志》所载其位于唐咸阳县西北十四里的方位信息，以及该陵园规模宏大，符合惠文王的身份等级。而部分学者认为该陵更接近《括地志》中记载的悼武王“永陵”的位置，并进一步推断周陵镇秦陵中南侧大墓为武王陵，北侧大墓为其夫人陵。还有部分学者根据《汉书》中关于“寿陵亭部”的记载，认为周陵镇秦陵是孝文王的“寿陵”。

关于严家沟秦陵的推测，一些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认为这是秦惠文王的“公陵”。部分专家认为其为悼武王“永陵”。部分学者则综合参照《史记》《汉书》等文献，结合最新田野考古调查与钻探成果，推断严家沟秦陵应为孝文王的“寿陵”。

关于司家庄秦陵的墓主身份，同样有不同的声音。部分学者认为该陵墓为悼武王“永陵”。部分学者认为司家庄秦陵的方位、所处地名均与文献中“寿陵”吻合，应为孝文王“寿陵”。

由于不同研究者所依据的标准各异、切入角度不同，在具体判定秦陵与秦王对应的问题上，学界仍存在较大争议。但赵汗青这次换了一种思路。他依据空间分布关系和陵园平面形制等相对稳定的分组标准，将争议秦陵划分为长方形陵园组和近方形陵园组两类，并以近方形陵园组为

例，通过多种假设推演与排除分析，最终唯一能自洽的答案浮出水面——上召窑秦陵，不是王陵，而是后陵。

为什么指向华阳夫人？ 证据藏在礼制之中

哪个秦陵对应哪位秦王？众说纷纭。但赵汗青认为，上召窑秦陵的新发现，为破解谜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研究思路。结合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可考葬于咸阳原的秦王与王后包括：惠文王、悼武王、孝文王和华阳太后。惠文后与悼武王后葬地无明确记载。而这几个人中，惠文王与悼武王是父子，孝文王与华阳太后为夫妻。

赵汗青将 4 座秦陵分成了：长方形陵园组，包括周陵镇秦陵与严家沟秦陵。近方形陵园组，包括上召窑秦陵与司家庄秦陵。若假定上召窑秦陵为惠文王“公陵”，依据诸多学者所持司家庄秦陵为悼武王“永陵”的观点，结合历史文献中葬于咸阳原的秦王（后）的记载来看，周陵镇秦陵与严家沟秦陵中应有一座属秦孝文王，而另一座则无法归属，陷入“无人认领”的尴尬局面，这一推断显然是不合适的。

如果假设上召窑秦陵为武王后陵，那么周陵镇秦陵和严家沟秦陵就属于惠文王和孝文王两位秦王。然而惠文王死后 61 年，孝文王才继位，“公陵”与“寿陵”的形制很可能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实际上周陵镇秦陵与严家沟秦陵都属于长方形陵园组。因此，上召窑秦陵是武王后陵的说法也被否定。

如果假设墓主为悼武王，则同样会出现一座秦陵“无人认领”的局面。所以，上召窑秦陵墓主不可能是悼武王。而若墓主为惠文后，则周陵镇秦陵和严家沟秦陵应与“永陵”和“寿陵”相对应，但悼武王和孝文王之间

相隔了在位长达 56 年的昭襄王，这与研究的结论不符。

“学界目前普遍认同神禾原秦陵墓主为夏太后，因此我们认为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可能是华阳太后。”赵汗青说道，“考古中，陵园与墓葬的规模通常与墓主身份等级有直接关系。”

而考古人员通过陵墓制度发现，4 座秦陵园中，陵园面积存在明显差异。司家庄、严家沟、周陵镇、上召窑秦陵陵园面积分别约为 137、73、61、35 万平方米。上召窑秦陵的规模为四者中最小，这一特征提示其墓主身份可能低于秦王等级。而在战国秦陵制度中，后陵也可以使用“亚”字形大墓与独立陵园，但其规模通常明显小于同期王陵。此外，从咸阳原秦陵的墓道特征来看，已形成一定的规制：王陵普遍以北墓道最长，而后陵则以东墓道最为突出。上召窑秦陵主墓的东墓道最长，恰与后陵的墓道特征相符。而作为孝文王的正妻、庄襄王的养母、秦始皇的祖母——华阳夫人无论身份、年代、地位，都最契合这座规模适中、形制独特的陵园。

如果将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定为华阳太后，那么司家庄秦陵就是孝文王“寿陵”，则咸阳原上剩余两座秦陵园的墓主，便自然对应为惠文王与悼武王。这一推断符合文献中关于二王葬于咸阳原的记载，进一步支持了“形制特征相近的陵墓，其营建年代较为接近，墓主之间的身份关联也更为密切”的类型学判断。

2000 多年前，当华阳夫人在深宫中接过那件楚服时，她也同时接过了吕不韦和嬴异人递来的命运筹码。她本是楚国之女，却成了秦国的定海神针。她以一次母性的认领，将庄襄王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也将嬴政推上了历史前台。没有她，或许就没有秦始皇，没有“书同文、车同轨”的帝国气象。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任俊丞

人物

李玉洁： 在观念影像中坚守人文初心

○律士



李玉洁

观念影像创作者李玉洁，长期坚守“人文为核，观念为魂”的创作追求，将对人类精神命题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热爱、对人文关怀的坚守，融入其作品的策划与创作中。她的作品，斩获德国柏林艺术双年展金奖、意大利列奥视觉艺术奖等多项大奖，并逐渐成为中国观念影像领域代表性人物。

作为观念影像创作者，李玉洁的人文坚守首先体现在她长期以“探讨人类共同的精神命题”为创作核心。在《海阔天空》系列创作中，她将“人类对自由与归属的双重追寻”作为主题，设计了“渺小人物与辽阔海天”的视觉结构：渺小人物象征个体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辽阔海天象征精神的自由，人物伫立海天之间的姿态则传递出对自由与归属的双重追寻。她通过对光影、色彩、构图的精心安排，营造出虚实相生、沉静悠远的意境。摄影家李怀峰评价：李玉洁的作品让风景摄影不再只是客观记录，而成为内省的媒介。这种创作取向正是李玉洁人文坚守的体现：让影像成为连接内心与现实的桥梁，也让观众在作品中照见自身、获得共鸣。

外，科举出身的士人也有专属顶戴：进士、举人、贡生佩戴金顶，生员、监生佩戴银顶。不仅如此，清代顶珠的材质，更是对应品级，绝不僭越，其规制表现形式为：一品官员，佩戴珊瑚顶；二品官员，佩戴起花珊瑚顶；三品官员，佩戴蓝宝石（蓝色明玻璃）顶；四品官员，佩戴青金石（蓝色涅玻璃）顶；五品官员，佩戴水晶（白色明玻璃）顶；六品官员，佩戴砗磲（白色涅玻璃）顶；七品官员，佩戴素金顶；八品官员，佩戴起花金顶；九品官员，佩戴镂花金顶。《清史稿·舆服志》中亦有所载：“文五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水晶石。吉服冠顶亦用水晶。”五品官员顶戴所使用的正是水晶珠，由此，考古人员推测该墓墓主应是清代中期的一位五品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该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青花带罩防风瓷灯，极具特色。据考古人员介绍，该灯瓷质细腻，釉面光滑润泽，采用了镂空等装饰技法，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除此之外，其余明清墓葬中均出土了前代的各类铜钱，如五铢钱、大泉五十、货泉、开元通宝、崇宁重宝等，多散置铺垫于棺内人骨的侧卧，此为当时常见葬俗。部分墓葬中出土墨书板瓦，有的有朱书，内容多是符篆，一般放置于人骨胸前或头部。这种墨书或朱书板瓦可能为道教“煞鬼镇墓”符，意为保护墓主尸魂不受邪魔侵扰。此次明清墓葬的发现，为研究该地区同期墓葬的形制及葬俗等提供了一批新的实物资料。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任俊丞

西安清凉山发掘明清墓葬 墓主或为清代五品官员

8 月 18 日，记者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为配合西安清凉山项目建设，考古人员对该建设区域内的 600 余座古代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 55 座明清墓葬，部分墓葬形制保存完好，在其中一座清代竖穴墓道土坑墓中，出土青花带罩防风瓷灯、青花瓷熏炉、顶戴、灯盏、瓷罐等 17 件随葬品。另有墓葬中出土前代铜钱、墨书板瓦等随葬品，为研究关中地区清代墓葬葬制、葬俗提供了新的材料。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4 月，为配合西安清凉山项目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陕西文物保护专修学院、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建设区域内的 600 余座古代墓葬进行了发掘，考古人员不仅在其中发现秦墓与唐宋墓，还发现了 55 座明清墓葬，且均为竖穴墓道单室墓，其中单人墓葬 31 座，双人合葬墓 15 座，三人合葬墓 1 座，四人合葬墓 1 座，另有 7 座墓葬形制不详。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发掘的 55 座明清时期墓葬保存相对完好，形制清晰，随葬品种类丰富，具有典型的中原地区明清墓葬的特征。

在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一项清代官帽，该官帽的顶戴为水晶质帽顶。据了解，所谓“顶戴”，特指清代官员官帽顶端的顶珠，是品级的核心标识。从顶珠色彩等级划分：一、二品为红色；三、四品为蓝色；五、六品为白色；七品及以下为金色。即便同一色系的顶戴，材质、色泽也有严格区分：一、二品分为纯红、杂红两类；三、四品分为亮蓝、暗蓝两类。除此之